

三阶教衰亡原因综论^①

杨学勇

三阶教衰亡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学说上的非难和政治上的禁断。就学说上的非难来说，主要是由于三阶教的一些学说符合正统佛教的传统并且不为统治阶级所喜。至于政治上的禁断，本文认为公元 600 年的禁断应主要跟高颀有关，是高颀失势的牺牲品；武则天的两次禁断由于主要给予其伪经、异端的定性，佛教界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唐玄宗的两次禁断主要是针对无尽藏进行的，所以禁断应主要出于经济上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考虑。从五次朝廷禁断来看主要是出于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

关键词：佛教 三阶教 非难 五次禁断

作者：杨学勇，1979 年生，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在隋唐时期成立和流行的诸多佛教宗派中，信行（540—594）创立的三阶教是唯一被统治阶级宣布为“异端”而屡遭禁止而终致衰亡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它一直以来被视为“异端”，又是对它如何禁断而使它最终消亡的呢？本文将把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与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从多方面探析与其衰亡有关的诸问题，以试图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学说上遭受的非难

《续高僧传·信行传》载信行“于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礼通道俗，单衣节食挺出时伦，冬夏所拟偏过恒习。故四远英达者皆造门而诘问之。行随事直陈曾无曲指，诸闻信者莫不顶受其言，通舍章疏从其化及，禀为父师之礼也，未拘之以法岁”^②，虽然传记说四方英达后来从其教化秉以师礼，但明显可见从信行立部之初，其行为就受到了质疑“初信行勃兴异迹，时成致讥”^③。开皇九年（589），信行被邀入京后，虽然“前后望风翕成其聚”、“自尔余寺赞承其度焉，莫不六时礼旋乞食为业，虔慕洁诚如不及也”，说明当时信行的影响的确是风靡一时，但佛教界对三阶学说的怀疑并没有停止，传记载信行死后“舍身收骨两耳通焉”，为何有此记载？强调灵异现象宣扬佛法神通固是一个方面，但暗示信行学说当时仍处于被怀疑状态，“有疑信行法者”^④ 乃是更重要的信息。据《付法藏因缘传》记载：“时婆罗门问优婆塞：‘我此

①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三阶教史研究——以敦煌资料为主》，项目批准号：09BZJ008

②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信行传》，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藏》第 50 册，台北：新文丰，1983 年 1 月，第 560 页上。

③ 同上，第 560 页中。

④ （唐）唐临撰《冥报记·释信行》，《大正藏》第 51 册，台北：新文丰，1983 年 1 月，第 788 页下。

髑髅皆悉无异，何故价直而有差别？优婆塞言：‘如前髑髅有通彻者，斯人生时听受妙法，智慧高胜贵其若此，相与多价；其半彻者虽听妙法未善分别，以是因缘与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听法，吾以是故不相与价。’”^① 据此可知若人生前听闻妙法则两耳贯通。对此，杰米·霍巴德（Jamie Hubbard）认为此说证实了两点：一是减轻了在京诸师对三阶教的怀疑；二是确信信行的佛法是真佛法。^② 本文认为，此信息更反映了当时对信行学说的怀疑，其学说在京已受到攻击，双耳贯通的说法只是缓解了被攻击的程度，进而也可以推知在信行死前，当时的佛教界已把三阶教当作异端看待。也许信行之所以选择林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双耳贯通，而且信行此举也的确收到了一些成效“（京城诸师）乃皆惭悔信服”^③。

《历代三宝记》言：“夫涅槃一理趣有万途，譬若帝京八方奔凑，涅槃亦尔，十方皆归，但路有艰夷，或迂或直，意迷其径解翻成惑，心醒其途惑即为解，所以经言‘众生未成佛，以菩提为烦恼；众生若成佛，以烦恼为菩提’，信行此途，亦是万衢之一术也。但人爱同恶异，缘是时复致讥”^④。费长房这段对三阶教的评价指出了三阶学说也是涅槃一理、万衢之一术，但因其修行途径不为有些人所接受而“时复致讥”屡屡遭到非难。而且此评价《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都予赞同，并没有把三阶教典籍归入伪经之列、把三阶教当作异端对待。费长房的这段评价发生在开皇二十年（600年）禁断之前，表明直到此时三阶学说本身乃是引起非难的主要原因，而发起非难者应主要是佛教中人。那么三阶学说的哪些特色容易引起“致讥”呢？以下将分析之。

（一）不合读诵大乘经典。《对根起行法》说：“四者一切经律论常说纯说颠倒。但使一切经文内，唯说颠倒众生是恶，不说是善，故名一切经律论常说纯说颠倒”^⑤，可见三阶教认为对一切经律论的颠倒是诸恶之一，而且这些经律论主要是针对第一阶、第二阶众生讲的，而没有针对第三阶众生讲的出世法。《三阶佛法密记》（卷上）载：

佛为第一、第二阶上根人说出世义，微细浅近真身应身一乘三乘大乘小乘普别俱说，为第三阶位上邪见成就不可转人说世间义不为说真实法出世义，今正为第三阶位前人说出世义兼为第一、第二阶下根人同说普真普正佛法。^⑥

可见，三阶教企图用普真普正佛法（三阶佛法）来代替十二部大乘经典。又第三阶众生乃是“莫问一切大乘小乘经俱不能救得空见有见众生”^⑦，能力低下不能辨别真伪，那么读诵十二部大乘经典（三阶教所说的别法）就会“颠倒解义、颠倒宣说、覆隐法藏，始从昙摩鞠多乃至摩诃僧祇如是”^⑧，所以应由他来摘编佛经即所谓“别为第三阶人抄略广说”，以三阶佛法（三阶教所说的普法）代替十二部大乘经典，从而才能纯益无损，“尽管未敢明言，信行实质上想用《三阶佛法》等代替佛经，故自己可以抄经，而不许别人抄经、诵经。这也是三阶教引起反对的最大根由。”^⑨

不合读诵大乘经典遭到了以净土宗为首的各个宗派的强烈反对。怀感在《释净土群疑论》中对三阶教用来支持其普法之说的《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乃至《法华经·劝持品》进行了反

① 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卷6，《大正藏》第51册，第322页中。

② [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 14.

③ （唐）唐临撰《冥报记·释信行》，《大正藏》第51册，第788页下。

④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册，第105页中。

⑤ [日] 西本照真：《三階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98年2月，第495页。

⑥ [日] 矢吹庆辉：《三階教の研究》（别篇），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6月，第79—80页。

⑦ 同上，第60页。

⑧ 同上，第65页。

⑨ 杨维中：《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第90页。

驳，以此说明三阶教所提出“（佛灭）千年之后，别法废时，不合读诵大乘经典”之说，是有违佛意的。^①此外，窥基《西方要诀释疑通规》“第十一会”之“释三阶行者五种小疑”^②、唐怀信述《释门自镜录》（卷上）^③及唐僧详撰《法华传记》^④等资料都表达了对三阶教提倡的“唯合行普真普正佛法得生十方佛国，若行别真别正佛法，及读诵大乘经等，即是不当根法，堕于十方地狱”^⑤的对抗，甚至对三阶教进行诽谤攻击，恨不得其死，其厌恶之情可见一般。^⑥

（二）普敬观是三阶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同时也是三阶教遭受非难的一大主因。信行提出普法四佛，认为众生都是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想佛，应把一切众生都当佛看待，并进而提出要效法常不轻菩萨“在道路行无问男女率皆礼拜”^⑦。普敬观的提出无疑像是一枚炸弹，使信行遭到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的反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儒家伦理为指导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不可动摇，而普敬观要求“无问男女率皆礼拜”则必违背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原则，违背“礼不下庶人”的规定，而且普敬观还提到要尊敬女子，而当时中国早已是父权社会，事事以男子为中心，以男方亲属为主，女方亲属降服，男尊女卑，总之妇女处在被动、歧视地位，即使在女性地位较高的武则天时期，妇女也未能从总体上改变受歧视的状况，而普敬观这种朦胧含糊的男女平等观念明显有违此古制。虽然庶族地主渴望得到士族地主的尊敬，但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让他们礼敬庶人则就上升到阶级矛盾了，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僧侣地主反对普敬观应主要与“沙门不拜君亲”有关。自从东晋成康六年（340），庾冰主张沙门应向君王敬礼而引发中国最早的礼敬问题以来，历经桓玄提出沙门礼敬君主、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隋炀帝规定“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唐太宗“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以及高宗、武后时期“沙门等致拜君亲”问题的讨论，都以王法妥协而告终。虽然唐玄宗时强制规定僧尼拜父母取得了胜利，但安史之乱后朝廷却又不不得不撤销了僧尼拜君的规定^⑧，可见，僧尼拜君亲问题几乎每次都遭到僧尼界的强烈反对，然而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信行却提出普敬观“无问男女率皆礼拜”，连拜君亲都遭到僧尼界的强烈反对何况其它，所以普敬观遭到僧尼界的反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为世俗地主乃至僧尼界所反对的，在一定程度上则为下层民众所欢迎。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就有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处在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普敬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这也是三阶教何以在下层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并获得普遍信仰的原因之一，它也成了劳动群众一种反对社会歧视的革命口号。“三阶教就是以其扭曲的普遍平等观念为下层民众的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它被统治者当局目为异端的主要原因之一。”^⑨也正是这种异端色彩的思想，使得民间秘密宗教从中吸取养料，如弘阳教的三阳学说就受到了三阶教的影响^⑩。

（三）三阶教是建立在末法基础上的，“末法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由于末法思想的流行以及北周武帝灭法的现实，使得佛教徒们确信当世已是末法时期。信行就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当世是恶世恶时、众生能力低下，从而把三阶学说建立在末法基础上。照

①（唐）怀感撰《释净土群疑论》卷3，《大正藏》第47册，第48页上、中、下。

②（唐）窥基撰《西方要诀释疑通规》，《大正藏》第47册，第108页上、中、下。

③（唐）怀信述《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51册，第806页中、下。

④（唐）唐僧详撰《法华传记》，《大正藏》第51册，第57页下—92页下。

⑤（唐）怀感撰《释净土群疑论》卷3，第48页上。

⑥参廖明活：《净土宗和三阶宗的对论——从怀感谈起》，《华林》2002年第2卷，第187—189页。

⑦（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12，第105页中。

⑧[日]砺波护著、韩昇等译《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第87—111页。

⑨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75页。

⑩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94页。

说这不能算做是别构异端、违背佛意，但信行却过分强化了末法说，把现实描绘的极度黑暗，如他说第三阶众生所处的三乘世界“亦名五浊诸恶世界娑婆世界、盲暗世间三界火宅，一切众生起于断常即是空见有见众生、亦名三乘众生十恶世界是”^①。五浊恶世，众生乃邪见、十二颠倒、诸佛法不救等，对现世过分渲染的黑暗不仅引起了佛教界的反感，而且有影射社会黑暗的嫌疑，自己的统治被描绘成恶世，这必定是不为人所喜的，尤其是那些好大喜功的统治阶级。隋文帝、武则天都宣称自己是转轮王下生，在境内实行正法。隋文帝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②，而为武则天服务的《大云经》、《宝雨经》也说：“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③，可见他们都说他们是正法治国，是佛付嘱正法于他们，而信行的末法学说却说他们统治的时期是末法时期，甚至说“求作转轮圣王”乃是声闻之人四恶欲之一^④。“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抹黑统治阶级的思想必将遭到统治阶级的非难而命运多舛，“三阶教义是对两次灭法的直接反应，这种对现实状况的描绘反映了社会动乱、佛法遭劫的情形。一旦政治形势稳定，‘国泰民安’，这一描述对统治者来讲无疑是一种诽谤、诬蔑，因此，引不起统治者的好感。”^⑤“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⑥，因此末法说多为民间宗教所利用，作为反对现世统治寻求救世主的口号。三阶教被朝廷视为异端与其末法思想必有关联。

二、政治上的禁断

自隋至唐三阶教接连遭受了五次禁断，这在中国宗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禁断不仅给了它异端的定性，而且最终导致了它的衰亡。下面将详细分析有关五次禁断的情况。

（一）公元 600 年的禁断：关于此次禁断在《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中都有记载，“开皇二十年（600 年）勅断不听流行，相同箴勅”。关于此次禁断的原因已经有多名学者进行了分析，矢吹庆辉认为高颀的失势与三阶教禁断颇有关系^⑦，此一说法为后来研究三阶教的学者所赞同，主要有西本照真^⑧、杰米·霍巴德^⑨等。高颀乃是隋朝三阶教的最大外护，信行“开皇之初被召入京，仆射高颀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⑩，相信此后三阶教一直得到他的庇护，但是随着他在宫廷政治斗争中的失利，“太子之废立，高颀谏言偶忤皇后之心，颀子表仁妻为太子勇之女，其它伐辽之役高颀不甲汉王谅之献策为谅所衔，及还为帝及皇后所忌，又高颀丧其夫人时因失皇后之好意”^⑪终于被隋文帝“除名为民”，并于 607 年被隋炀帝所杀。与此相应，三阶教在开皇二十年，即高颀除名的次年，也遭受禁断的命运。此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

① [日]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第 75 页。

② （唐）法琳撰《辩正论》卷 3，《大正藏》第 52 册，第 509 页上。

③ （唐）达摩流支译《佛说宝雨经》卷 1，《大正藏》第 16 册，第 284 页中。

④ [日]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第 27 页。

⑤ 杨维中：《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第 91 页。

⑥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 页。

⑦ [日]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第 45—48 页。

⑧ [日] 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第 131—132 页。

⑨ [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p. 196—197.

⑩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信行传》，第 560 页上。

⑪ [日] 矢吹庆辉著、墨禅译《三阶教之研究》，《海潮音》第 16 卷，第 3 号，第 49 页。

对高颀的攻击中也牵涉到了僧尼,《隋书·高颀传》载:“沙门真觉尝谓颀云:‘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①,而三阶教就恰恰处在高颀舍宅为寺的真寂寺中,这样在处置与高颀有关的僧尼时三阶教可能也就被牵涉其中了。如以这样的推论来说,第一次禁断的主因很有可能是由纯粹的政治牵连而起^②。

杰米·霍巴德在《信行与无尽藏的创立》一节中基于《大乘无尽藏法》的撰写、《大乘无尽藏法释》中的十六种无尽藏行,以及信义只在《太平广记》中提及而在其它史料或僧传中没有记载等情况,认为信行可能是三阶教十六种无尽藏行和无尽藏理论的创立者,并把此理论实践在了无尽藏这个制度上。基于此立论,他认为“无论如何,繁荣的无尽藏的记载表明600年的禁断收效甚微”^③,但实际上化度寺无尽藏是由信义于武德二年(619)或其后不久所设^④,与公元600年的禁断并没有关系。

上文已提及三阶教是在高颀被除名的次年遭禁的,可推知此次禁断主要是源于政治原因,是高颀失势的副产品,所以隋政府并没有对三阶教采取严厉的措施,只是简单的一句“勒断不听流行,相同箴勅”,教徒没有被流放、文本没有被销毁,所以“隋文虽断流行,不能杜其根本”^⑤,这就为它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其次,三阶教普敬认恶、对根起行等学说受到广大欢迎,《故大信行禅师铭塔碑》提到在信行死后尚有“法师净名、禅师僧邕徒众等三百余人”。再次,无尽藏思想的实践对减轻开皇二十年的禁断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不久隋炀帝弑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压迫严重、民不聊生,隋末战争的爆发等等都给人一种末法的景象,这利于三阶教的传播,唐朝建立又为它提供了契机。所以,后来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中记载三阶教时说“然其属流广海陆高之”^⑥、“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⑦。

(二) 武则天的两次禁断: 编于武则天时期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载:

奉证圣元年(695)恩敕,令定伪经及杂符箓等遣送祠部进内。前件教门既违背佛意,别构异端,即是杂符箓之限。又准圣历二年(699)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辄行皆是违法。幸承明敕,使革往非,不敢妄编在于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⑧

这就是有关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圣历二年(699)禁断三阶教的情形。但从《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所载法藏“如意元年(692),大圣天后闻禅师解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⑨以及“又则天经序云将二京之所蓄用两京之旧邸,莫不总结招提之宇,咸充无尽之藏”^⑩乃至“按武后移此寺无尽藏于东都福先寺,日久渐耗,寻移归本院”^⑪的记载看,武则天起初是支持三阶教的。

何以从最初的支持转而有695年、699年的禁断呢?现有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 武则

①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183页。

② [日]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第132页。

③ [美]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p. 200.

④ 拙文《三阶教无尽藏法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141—145页。

⑤ (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18,《大正藏》第55册,第679页上。

⑥ (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5,《大正藏》第55册,第278页上。

⑦ (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18,第679页上。

⑧ (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475页上。

⑨ 参(清)王昶撰《金石萃编》(捌)卷71,据光绪上海醉六堂印本。

⑩ (宋)道诚集《释氏要览》,《大正藏》第54册,第304页中。另参《全唐文》卷97“方广大庄严经序”。

⑪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第245页。

天把复制化度寺无尽藏到其家寺福先寺的失败，当成了对她的一种冒犯^①。(2) 三阶教信徒李贞多次在信行起源地相州当刺史，且李贞数次撰写信行碑^②，可知李贞为三阶教的外护。但他不满武则天的统治，于垂拱四年（688）叛乱，同年被杀^③，由此推测李贞的叛乱在禁断中起了一定作用，可能与三阶教的禁断有直接的关系^④。此外，王惠民还提到三阶教信徒梁寺夫妇也相继死于垂拱四年十月、九月，可能与688年“诛其（宗室诸王）亲党数百余家”有关^⑤。3、与武则天对佛教整体态度的转变有关，特别是在694年火烧明堂之后，“所以三阶教不是唯一先前被支持，大火之后被政府禁止的佛教团体。”^⑥4、认为与校经目僧、对三阶教多有批判的《释净土群疑论》作者怀感有关，此隐含有佛教界内部的迫害因素^⑦。第一种说法可能夸大了无尽藏在此次禁断中的作用，虽然复制的失败可能令武则天恼火，但她并没有取缔无尽藏，由三阶教信徒藏于长安年间又奉制检校化度寺无尽藏可知。关于第二种说法，本文认为，与此次禁断关系不大，虽然李贞是三阶教的外护，但他与此次禁断相距年限已久，不同于高颖与公元600年的禁断。虽说李贞生前撰的《信行禅师兴教碑》直到武则天死后的神龙二年（706）才立，但这并非主要针对三阶教而为，而是因为与李贞有关。而且就在李贞事件不久的永昌元年（689）三阶教大德惠恭却能在皇家寺院法门寺立碑^⑧，说明并没有受到政治事件冲击。至于第三种观点则有何不见其它宗派被禁断的疑问，虽然火烧明堂之后武则天对佛教的整体态度有所转变，但似乎与三阶教的禁断并没有关系。第四种观点与本文从教义方面解释三阶教被禁断的看法相符，以怀感为首的净土宗对三阶教的打击的确对三阶教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武周时期只有一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其中提到的校经目僧怀感是大福光寺僧人，西本照真认为其与《释净土群疑论》作者西都千福寺大德怀感是同一人不知源于何据？

证圣元年敕令把三阶教典籍作为伪经、杂符箓之类，从而认为是别构异端，这是第一次明确指出三阶教是异端、《三阶杂法》二十二部二十九卷被列入伪经目录，可见此次禁断的着眼点是三阶教典籍，说其学说乃违背佛意。圣历二年的禁断主要是对三阶教实践诸方面的限定，是对证圣元年敕令的进一步强化，从文意看似乎无尽藏也在禁断之列，但实际上并没有禁断，从法藏“长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可知武则天仍是支持无尽藏的。虽然此次禁断的直接原因已不可考，但鉴于禁断的内容特别是伪经的定性，可能主因源于佛教界的攻讦，例如法藏敦煌文献P. 2550号多处提到某些僧人对某位三阶教禅师的诘问、“今有八州邪见道俗欲害于我”及“关内诸寺大德比来常欲拟奏阁梨”等，说明三阶教此时仍受到其它佛教宗派的攻击。

另外，自信行死后三阶教内部持续的党争^⑨也削弱了三阶教的整体势力，使其在与其它宗派的抗争中处于劣势。自身内部对教义的分歧，也给其它宗派定性三阶学说乃是违背佛意的伪经提

① [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 207.

② (宋) 陈思撰《宝刻丛编》卷7, [清] 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5月, 第305页下。

③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6,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5月, 第2662页。

④ [日] 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 第134页。

⑤ 王惠民:《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艺术史研究》第六辑, 2004年, 第332页。

⑥ [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 208.

⑦ [日] 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 第134页。

⑧ 杨维中:《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 第83页。

⑨ 参 [日] 塚本善隆:《三階教資料雜記》,《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 东京: 大东出版社, 1975年3月, 第237—238页; [日] 早川道雄:《三阶教团の性格》,《丰山学报》第39号, 1996年6月, 第84—96页。

供了借口。

(三) 唐玄宗的两次禁断: 唐玄宗对道教比较优待, 而对佛教则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政策, 之所以采取这种宗教政策的原因之一是“清除武则天时期佛教大盛的政治影响和宗教偏差, 企图通过振兴道教来重树李唐王室的威信与形象, 这主要表现在唐玄宗统治前期”^①, 在此大背景下与三阶教有关的措施主要牵涉的是无尽藏。《唐两京城坊考》载: “至开元九年以所余散京师诸寺, 遂绝焉”, 但记载最详细的乃是《册府元龟》及《全唐文》, 现引录《册府元龟》全文如下:

(玄宗开元九年) 四月壬寅诏曰, 内典幽微, 惟宗一相, 大乘妙理, 宁启二门。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 每年正月四日, 天下士女施钱, 名为护法, 称济贫弱, 多肆奸欺, 事非真正, 即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 明为文簿, 待后处分。接着又进一步规定:

六月丁亥诏化度寺无尽藏财物田宅六畜, 并宜散施京城观寺。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桥梁, 有余入常住不得分与私房, 从贫观寺给。仍令御史张樽与礼部侍郎崔据、京兆尹孟温礼取元奏数, 拣京城大德戒行灼然者共检较量事均融, 处置讫奏闻。诸州长官及按察司所察获钱物, 以委州使准此共勾当, 散配处分讫申所司。^②

这是玄宗第一次禁断三阶教, 很明显此次禁断主要是针对无尽藏, 看其原因乃是因为无尽藏“称济贫弱, 多肆奸欺, 事非真正, 即宜禁断”并于六月散施无尽藏财富。然而从无尽藏教理看, 它更提倡救济贫弱“善男子, 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 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 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 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蚊子, 此二种田, 悲田最胜”^③, 并且也没发现有关无尽藏放高利贷的记录。此外, 朝廷散施无尽藏的措施也与三阶教一贯提倡的方式一致。

然而, 由于此次主要是针对无尽藏这个机构, 所以应该从无尽藏本身来寻找禁断原因。首先无尽藏占有帝国的大量财富, 已威胁到帝国的财政安全。自无尽藏设立之初就已出现“京城施舍, 后渐崇盛。贞观之后, 钱帛金绣积聚, 不可胜计……燕、凉、蜀、赵, 咸来取给, 每日所出, 亦不胜数”^④的状况, 到8世纪初寺院占有大量财富的现象更是引起了政府的不满。谢和耐曾论述道: “大型佛寺中除了在其金库和粮仓中贮藏的食物和各种财物之外, 他们还拥有其数量经常是很庞大的库存现金, 尤其是在它们从事以典质而放贷(质钱)时更为明显, 因为这类放贷、赎回典质札和付息一般都以铜钱计算。……所以帝国政府被迫限制这些财政机构的库存现金铜钱。元和十二年一月间的一道诏令, 严禁他们在街里市场上保留超过5000贯钱的现金。佛教大家户的习惯是每年年初向化度寺和福先寺中的无尽藏运去满满的几车铜钱。以上无疑就是导致713年(应为721年)没收这些金库中全部财产的原因之一。”^⑤由此看来, 此次禁断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而不同于此前着眼于三阶教典籍。其次, 无尽藏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敬田者即是佛法宝, 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蚊子, 此两种田悲田最胜”, 然而这些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慈善机构起初多为朝廷所创建, 如齐文德太子之“六疾馆”、梁武帝置孤独园等。随着佛寺从事慈善事业的发展, 到8世纪时佛寺的社会力量已引起政府的极度猜忌。734年玄宗更是下令将京师的乞儿全归病坊收管, 所有额外经费由政府以利钱支付, 加大了官方参与悲田院的分量, 以此削减佛寺的影响。“其实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 很早就出现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

① 刑学敏、王洪军:《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第95页。

②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4页上。

③ 《佛说像法决疑经》,《大正藏》第85册,第1336页上、中。

④ (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第57页。

⑤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6—27页。

提供者的想法。这观念在早期的儒家传统中已可见，……即是说私自以一己之财济贫有影射政府无德的嫌疑”^①，可见无尽藏就是犯了这个政治性忌讳，把功劳全给了自身而没有归功于政府，“抢”了本应政府所作的工作，这可能也是“武后移此藏于东都福先寺”的原因之一。看来东都新无尽藏的设立就是为了取代化度寺无尽藏，然而却又不能为政府所用“天下物口遂不复集，乃还移旧所”，于是“东都新无尽藏院则非武后之豫期，不见其流行，遂复移于旧所，而陷于不悦之状态”^②。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唐政府从佛寺手中“夺取”了济贫的责任，特别是会昌灭佛后“在社会救济一事上，宗教团体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主力落在中央政府身上，这个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高峰。”^③。

此外，有些学者认为此次三阶教遭禁可能与三阶教信徒参入密谋毒害玄宗的事件有关。杰米·霍巴德认为薛稷是立于神龙二年八月的《唐信行禅师兴教碑》的书写者，并且与伪造《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有关，所以可以暂时认为是一个三阶教徒或者说至少是个三阶教信仰者。他于713年密谋毒害玄宗失败后被迫自杀，“因而，尽管证据仅仅是依靠情况而定的，但作为一个信行跟随者的造反可能在禁断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④，“就像 Forte 所推理的‘如果师利跟那次阴谋的某些成员关系密切，一旦玄宗巩固了他的势力，就采取行动对付师利及其教派将是很自然的事。’”^⑤。西本照真也依据《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说黄门侍郎薛稷和中书令崔湜是三阶教的外护，而他们由于与713年太平公主事件有关而被处死，看作是唐玄宗彻底禁断三阶教的开始^⑥，但是据“撰录者曰‘余曾以此事亲问流志三藏，三藏□云吾边元无梵夹，不曾翻译此经’”，知师利乃是假托三藏菩提流志伪撰《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那么是否其他人都是师利擅自假托的呢？如此则薛稷、崔湜未必真的参入了伪造《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之事。再者，唐玄宗彻底禁断三阶教并非在713年而是在721年^⑦，如此则与713年太平公主事件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最后，据“其僧师利因少斗讼，圣躬亲虑，特令还俗。岂非上天不祐降罚斯人，又临终之时腹大如瓮恶征遄及可不惧欤”^⑧，知师利没有受到皇帝的压迫。由上看来，师利或密谋毒害玄宗的成员可能与721年禁断无关。

唐玄宗对三阶教的另一次禁断记载在《开元释教录》中：

我开元神武皇帝，圣德光被普洽黎元，圣日丽天无幽不烛，知彼反真构妄出制断之。开元十三年（725）乙丑岁六月三日。敕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所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从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还俗。幸承明旨使革往非，不敢妄编在于正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⑨

可见，此次禁断应是对721年禁断的强化，是对三阶教的进一步打击。它不仅除毁三阶教典籍，

①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32—33页。

② [日]矢吹庆辉著、墨禅译《三阶教之研究》，《海潮音》第16卷，第4号，第579页。

③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4页。

④ [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 208.

⑤ 同上，p. 217.

⑥ [日]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第134—135页。

⑦ 《两京新记》载唐玄宗第一次禁断三阶教是在开元元年（713），而《册府元龟》则说在开元九年（721）。现在学界已明确指出玄宗的第一次禁断发生在721年。参[美]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pp. 213. 另外，参“自矢吹以来都依据《两京新记》的记载定为713年，砺波护依据《册府元龟》卷159的记载把它纠正为开元九年（721）”（[日]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第136页）。

⑧（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18，第672页下。

⑨（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18，第679页上。

而且令三阶院除去隔障与大院相通，而“院”是指寺院内部的建筑群，出家人是按照他们所属的“院”分类的，这些院中的僧侣常常是专门修习不同的戒律^①，“当时的一个佛寺往往居止着几个教宗派的僧人，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六《寺塔记》等书中，反映出一个佛寺有禅院、律院、华严、净土、三阶等院……”^②。“除去隔障”就是要取消三阶院的独立性，使他们混迹于大院从而失去自我，也就是说要同化掉三阶教这个派别，并令纲维严加监控三阶教的活动，从而使其失去活力慢慢枯萎而死。

总之，玄宗的两次禁断对三阶教来说是致命的，比其前任何一次禁断都严酷，措施都更为有利，它不仅把三阶教的典籍悉数禁断除毁，而且掐断了三阶教的经济命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它的独立性。虽然此后随着统治者的更换，三阶教一度出现再兴，但终究是回光返照的假象。经过唐武宗会昌灭佛的严厉打击后慢慢衰亡，其教义实践等已慢慢融入到其它教派中，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正如喻松青所言：“三阶教主张众生皆有佛性，强调教团的组织生活以及在实践中提倡布施、捐纳、礼祈等，都会对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三阶教在隋唐时曾受到镇压，它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民间流传，这样很自然地民间秘密宗教从中取得了养料。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中常见的三乘说、末法说、众生皆有佛性说、教团中的纳银、互助等，有着明显的三阶教的痕迹。”^③

三、小 结

上文的分析主要把三阶教衰亡的原因归咎于学说上的非难和政治上的禁断，虽然对衰亡因素的分析是单个进行的，但实质上诸因素不是孤立的。就学说上的非难来说，主要是由于三阶教的一些学说符合正统佛教的传统，如三阶教提倡“不合读诵大乘经”、“见形像及以诸经不多恭敬为是泥龕”等等，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深为当时的正统佛教所厌恶，由此引来了佛教其它宗派的攻讦，尤以净土宗为甚，三阶教人死后下地狱变乌龟变蛇的记载即是明证。此外，有些观点也不为统治阶级所喜，如对末法恶世的过分渲染等。可以相信学说上的非难是一直伴随着三阶教始终的。至于政治上的禁断，虽然没有材料证明禁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根据相关材料分析，本文认为公元 600 年的禁断应主要与高颀有关，是高颀失势的牺牲品；武则天的两次禁断由于主要给与其伪经、异端的定性，故认为佛教界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或者说主要是出于学说上的考虑），但遗憾的是限于材料本文不能证明主要是哪个宗派的作用，至于其它因素如李贞事件等则可能相对影响较小；唐玄宗的两次禁断主要是针对无尽藏进行的，所以禁断应主要出于经济上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考虑，无尽藏的雄厚财富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其福利事业又与“一直以来，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具有很大的排斥性，个人善行与皇家仁政不能相提并论，仅具辅助及点缀意义”^④的观点明显相背，至于太平公主事件等应与此次禁断关系不大。从五次朝廷禁断来看，主要是出于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对比之下，对三阶教的敌视，教内远远大于朝廷，教内是反对的主声，朝廷是其消亡的主因，教派的目标通过朝廷得以实现，正是因为不为统治阶级所认可才正式的被冠以异端名号，屡遭取缔，并最终衰亡的。

（责任编辑：黄夏年）

①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第 37 页。

② 刘长东：《论隋唐三阶教与净土教的关系》，《新国学》第 2 卷，2000 年 10 月，第 376 页。

③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 94 页。

④ 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史学月刊》2006 年第 2 期，第 100 页。